

目 录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回忆片断

-德穆楚克栋鲁普 (1)
- 德穆楚克栋鲁普与傅作义争夺鸦片过境税.....任秉钧 (21)
- 云继先部百灵庙武装暴动经过.....任秉钧 (24)
- 绥境蒙政会始末记.....经革陈 (29)
- 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哈斯瓦齐尔 (39)
- 回忆在伪蒙疆政府时期.....奇天祥 (55)
- 奇子祥刺杀奇文英的前前后后.....刘映元 (82)
- 我刺杀奇文英的前因后果.....奇天祥 (90)
- 关于刺杀奇文英案两文的补充.....奇尙斌 (118)
- 奇文英的一生.....白凤岐 (125)

国民党反动派在河套地区的最后挣扎

- 我任伪安北县长期间的片断回忆.....王元魁 (147)

- 記傳部印刷厂偽造人民幣事……………潘佳緒(168)
- 記蔣雁行任“綏遠都統”期間的几件事……………关鍾麟(173)
- 我所知道的“长头发教”……………溫立中(192)
- 汪容昌和他創办的蒙文书社……………白彥巴圖(203)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回忆片断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淪陷，从而日寇又向西部各盟旗伸其侵略的魔掌，于是与热河接壤的錫、察两盟便首当其冲，以致人心动蕩，惶恐不安。适在这年冬，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駐京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吳鶴齡，将他一手制定的“蒙古各盟部旗組織法”呈請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公布，我当时是苏尼特右旗扎薩克亲王兼錫林郭勒盟副盟长，錫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因病請假，由我代理盟长职务。我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托滂江电报局长徐茂候代拟电报稿，盖上盟长大印，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拍发，反对吳鶴齡的这个“組織法”。同时我派錫林郭勒盟駐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賴赴北平面見陆海空軍副司令张学良，洽請撥給枪枝弹药等物，并联络包悅卿、賀喜业勒图默尔根

（号颢伯，即小卓王）、达密林扎布（太仆寺旗前任总管）等，以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也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反对吴鹤龄的“组织法”，一面吹捧我“素孚众望，洽顺輿情”，应出任蒙旗宣抚使。包悦卿、达密林扎布二人并到南京活动，宣传我握有五千骑兵，是蒙古具有实力的人物。大吹大擂了一番。

这两次电报的拍发，和包悦卿的吹捧，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一九三二年秋，蒋派他的亲信桂永清（当时任军官训练班主任）和军政部到察盟以枪换马的余玉琼、彭秉离等前来我旗（苏尼特右旗）访问，这时包悦卿也由南京北返，陪伴桂永清一同前来。桂永清对我是恭维备至。包悦卿曾将蒙古旅平同乡会电请派我出任宣抚使事和桂永清谈了，桂对包悦卿说：“我看德王是个年青有为的王爷，宣抚使是老年人干的事，他干这个干嘛，依我之见，应当组织军队，扩充实力，在蒙旗先组织一个骑兵师或旅，当一个中将师长或旅长，不比干宣抚使好吗？”包悦卿当将此话转告我，我当下表示首肯。桂就给蒋介石打电报，并将电报原稿交由包悦卿转与我看，全文记不清了，仅记得有“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指我）”一语。桂对我这样重视和吹捧，使我感到无上的欣慰。嗣他又表示想去看索王，我就派我的专用汽车把他送到烏珠穆沁右旗。他回来向我说：“我看索王凝神注目看人的神气，静听别人谈话的态度，是一个具有成见，十分固执的人，可能对你作些新的事情有障碍，希望你注意及之。”

当他临行时，又对我說：“靜候佳音吧，蔣委員長可能召見你。”

果然他走后不久，蔣介石就电召我前往武汉相見。我接到电报后，认为机不可失，就偕同补英达賴、韓凤林、丁我愚等前往武汉。路經北平时，曾去面見张学良，张即指示鐵路局为我等一行特备专車一輛，并派蒙旗处处长袁庆恩率同宪兵四人护送。到武汉后，行营招待我們住在璇宮飯店，次日即前往行营見蔣。关于桂永清所說組織蒙古騎兵之事，未作詳談，囑我和秘书长楊永泰、參謀长曹浩森接洽。我見蔣后，就令韓凤林拟具蒙古騎兵师編制計劃和所需要的武器，送交行营办公厅。嗣又由楊永泰和曹浩森接見我，說給我“蒙古保安統監”的职务，我当下想到，索王是錫林郭勒盟保安长官，我如担任保安統監的职务，地位就在索王之上，可能引起索王的不滿，不如担任蒙古騎兵师长又实惠又相当。当向楊、曹表示不愿接受說：“我此次来見委員長，不是专为要官而来。”話虽漂亮，言甚刺耳，楊永泰聞听之后，馬上表現不甚愉快的神气，沒有再作什么回答，我就辞出归寓。

嗣聞招待我的韓副官說：“蔣委員長要去长沙視察工作。”我为了表示拉近乎，亲到长江岸上送行，不意到岸送行者，仅有武汉警察局长陈希曾。接着楊永泰、曹浩森等宴請我，还邀請我坐飞机环繞武汉上空，又招待我参观汉阳兵工厂、长江上的軍艦、黃鶴楼等名胜古迹和武汉大学各处。

当时武汉小报上曾登有“带着油松大辮子的德王，在武汉大出风头”的消息，被行营給以停刊多日的处分，表示对我的“尊重”。参观各处后，行营秘书邓文仪前来璇宮飯店見我說：“关于編制蒙古騎兵师事，委員长指示以后再行考虑，至請发武器一节，答应拨給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枝，可在此具領，另拨迫击炮两門，須到南京軍政部洽領。”我遂派丁我愚前往行营軍械部門領到机关枪四挺，所发步枪数百枝，因系破旧之物未即具領，請再补发新的枪枝。

在武汉告一段落后，留下丁我愚洽办未完之事，我就偕同补英达賴、韓凤林等返北平，依据蒙藏委员会关于“重选盟旗代表，改組办事处”的命令，进行組选代表，反对吳鶴齡之事。这时除錫林郭勒盟已确定郭尔卓尔扎布、补英达賴为代表外，烏兰察布盟也确定拉希色楞为代表，伊克昭盟确定僧格林沁为代表，并均已先后到达。其他各盟旗代表就在北平酝酿組选，結果又确定賀喜业勒图默尔根、多尔吉为哲里木盟代表，呼、昭两盟因既已淪陷，又无适当人选在北平，沒派代表参加。組織就緒后，代表等就赴京請愿。国民党中委白云梯、克兴額等想利用晋京代表請愿的声势和蒙旗地方实力的支援，特慫恿軍政部长何应欽来电邀我赴京洽商蒙事。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陈敬修也来北平迎接班禪赴南京，特到嵩祝寺見我，表示欢迎我和班禪同車南往。这时吳鶴齡已被蒙藏委员会委員长石青阳解除了蒙事处处长职务，調任参事閑散之职，并命令他重选蒙旗代表，改組办事处。吳鶴齡在

这种压力之下，感觉对他不利，就匆忙地由南京赶来北平，請于华亭（蒙名罗布桑車珠尔，系吳岳父之喇嘛弟弟，后还俗为鎮国公）出面奔走联络，托班禅的堪布和烏兰察布盟的德瓦根敦等为我们居中調解，吳鶴齡偕同于华亭曾亲到嵩祝寺和我見面，接着又由班禅出名宴請我俩，堪布們代表班禅陪同我俩聚餐，劝我俩合作。继又由德瓦根敦、拉希色楞等出面在擷英番菜館邀請我俩宴会，进行調停，但我俩均未表示接受。

我和班禅同乘专車到达南京后，一面見何应欽洽办請拨武器之事，一面和晋京請愿代表商洽进行反对吳鶴齡、改組办事处之事。桂永清更是时来看我，陪同我往見以关心边事自居的考試院长戴季陶，桂以“蒙古通”自居，向戴介紹說：“我曾亲到錫林郭勒盟各旗訪問，知道錫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均唯德王馬首是瞻。”

吳鶴齡托請巴文峻出面調解，巴曾到中央飯店見我說：“吳鶴齡业已表示愿意奉令改組办事处，他只担任卓索图盟代表，其他各盟旗代表均由新代表担任。”我没有接受巴文峻的調停，并內定补英达賴为新的办事处处长，准备接收。后来因白云梯与石青阳爭权夺利，改組办事处之事就被擱浅下来，我表示要整装回蒙，以相对抗。

为时不久，蔣介石由武汉返京，先在勵志社宴請我和各代表，继又叫桂永清通知，在軍官学校单独召見我，屆时由桂永清陪同我前往見蔣。寒暄后，桂永清就把建立中央軍官

学校张北分校計劃递上請蔣閱看。蔣略加翻閱即放在一边說：“現在決定在张北設立分校（张北分校后来沒有办成），特派桂永清按照黄埔的精神办理，培养蒙古方面的軍事干部人材，好做編制蒙古騎兵师的准备。”继又說：“蒙古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为此操心。”

現在回想起来，桂永清到我旗訪問时为什么向我建議組織蒙古騎兵呢？嗣到武汉見蔣时为什么楊永泰又提出給我蒙古保安統監呢？后在南京見蔣时为什么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呢？据我現在的看法，蔣介石这样重視我，是有原因的，对我职位問題上前后有了变动，也是別有用心的。因为在民国十九年閏、馮倒蔣失敗后，閻錫山特派赵太东、仲躋翰二人由蒙人道布頓（曾任察哈尔一个旗的总管）当翻譯，想通过我旗前往外蒙，被我旗防卡盘查扣留。我曾将此事告知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我想刘翼飞定告知张学良和蔣介石。从此蔣介石对我可能有了印象，想爭取我作为他統治蒙古的助手，并认为我旗是通往外蒙的要冲，有組織蒙古騎兵进行“防共”的必要，同时在蒙古組織起一部分武力，对于附近的杂牌軍隊也发生牵制的作用。所以蔣介石特派桂永清亲到我旗察看情况时，有向我建議組織蒙古騎兵之事。嗣到武汉見蔣时楊永泰又提出要給我蒙古保安統監名义，不給蒙古騎兵师长的实权，是想利用我作招牌，不愿叫我掌握实力，所以后在南京見蔣时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的計劃，而叫桂永清为他培养軍事干部掌握实权，叫我担任空洞的保安統監的具

体措施。記得在北平解放，我到南京时，桂永清已当上了海軍总司令，特在他的家里招待我宴会，并請国防部五个厅处长、国民政府一个管軍事的局长和白云梯等作陪，他情不自禁地流露說：“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計劃，在內蒙組織起来五万騎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去，也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接着他又向我介紹在座的厅处长：这位是主管軍械的，那位是主管电台的，說我如有所需要时，請向他們各位进行接洽好了。通过这一段談話，足証蔣、桂有意叫我組織騎兵，是以“防共”为第一要义的。其后我在阿拉善旗发动“西蒙自治运动”，前往广州請愿时，桂永清特又給我机关枪四挺、步枪二百枝，也是想利用我在內蒙組織“反共”力量，为他們效力，作垂死的掙扎。

在南京見蔣后，我即将韓凤林留下在軍官訓練班当教官，并以需用軍事人材为名，向高級教育班交涉要出了正在受訓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向軍政部洽領迫击炮二門及补发武汉行营許可的步枪几百支，还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和正在求学的蒙古青年做了接触，以期对我有深刻的印象。这时我对于改組办事处之事已感冷淡，又不愿再陷入白云梯等爭夺权位的旋涡里，遂分別到各机关訪問，各机关首脑也分別宴請我，这样应酬聯絡了几天。这时外蒙的逃亡者迪力瓦还在南京，我和他常相过从，有一次我問他：“內蒙搞自治可以不可以？”他答說：“外蒙既可以进行独立或自治，內蒙为什么不可以自治。”这几句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不

愿再在南京作无味的政爭，就偕同一部分代表北返。另一部分代表参加了办事处的改組。吳鶴齡的处长改称主任，这一場政爭就这样結束了。記得当时报纸上登載着“德王等晋京請愿未遂，拂袖返蒙”的消息。我这次竟落了一个乘兴而往，負气而归。所以到北平后，又和旅平蒙古知識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学生，由云继先和于福賡、云敬圣帶領着，随我一同返归苏尼特右旗，着手培养人材和力量，备作待机而起的政治資本。从这一段經過中，說明我武汉見蔣是想取得蒙古的軍权，赴京請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以償，于是便想归来搞自治，实现我的政治野心。

我回旗后，即在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派云继先、于福賡二人为教官，把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一律編入該队受訓，把从武汉和南京所領到的武器拨归該队应用。这时我认为即使中央軍校张北分校成立起来，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的系統，一切須受他人的监督，不如自办一个学生队，訓練自己的干部方便。不久，陈紹武、陈国藩、霍宝书、烏鵬、王澤春由綏包一带前来苏尼特右旗，丁我愚、亢仁等也相继前来。我正招致青年来归，当然力表欢迎，推誠相与，常相聚談，共同研究討論怎样对待当前紧张时局下的蒙古問題，决定由錫林郭勒盟联合烏、伊两盟发动内蒙自治。这时我儼然以青年領袖自任，以期出問蒙事，掌握大权。

二

我虽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做为我的臂助和基干，但自知我的职位不过是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纪又轻，不能领袖群伦，号召各盟旗参加，必须得到年高、“爵尊”之王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锡林郭勒盟进行自治，首先必须取得盟长索王的赞同和楊桑（楊桑曾任过锡林郭勒盟盟长）等老年王公的谅解。楊桑向以我的前辈自居，认为我好大喜功，时常流露不满之意，曾有“锡林郭勒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王，不知什么时候闖下乱子，锡林郭勒盟前途殊堪忧虑”之語，盟长索王对我也是不满的，因此，必须设法说服他们同情自治，最低限度不致出头阻挠自治。經我反复思维，认为通过班禅来说服他们是个最妥善的方法。这个方法还是郭道甫和我谈过的。

記得在一九二九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見张学良洽拨武器，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见面，常相过从，他曾对我說：“外蒙和内蒙情况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独立成功？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历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沒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无一成功。現在听说班禅的堪布們正請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

当联合各旗集資在蒙地为班禪建庙，請班禪留在內蒙，做为宗教領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他这个建議，我很以为是，返归錫林郭勒盟后，即和盟长索王商量，索王也极表同意，当派我和松津旺楚克（浩济特左旗扎薩克郡王）代表錫林郭勒盟前往北平聯絡各盟旗王公商洽为班禪在內蒙建庙，挽留班禪在內蒙长期居住，各旗王公一致表示贊成。适这时班禪在北平，郭道甫也来平公干，我們就去面見班禪，确定在錫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各建一所庙。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哲里木盟已經淪陷，遂将各旗集資十万余元，在我旗和烏珠穆沁右旗为班禪建庙二所，在一九三一年并請班禪前来我旗过冬，一九三二年夏在錫林郭勒盟各地唸經。因此，既取得班禪对我的好感，也使錫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对班禪有深刻的印象。

迨至一九三二年，我正和青年們研究进行自治，設法說动索王同意时，班禪由烏兰察布盟百灵庙前来我旗，并要去貝子庙、烏珠穆沁右旗等地唸經，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請班禪帮助我，同他前往烏珠穆沁右旗，說服索王。在我們沒有到达之前，听說日本关东軍参謀田中久曾帶同蒙語翻譯金永昌前来劝說索王赴“滿洲国”參觀，并要求在烏珠穆沁旗設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人到过呼伦貝尔盟海拉尔向凌陞探詢日本对蒙旗的情况，凌陞曾答复索王說：“日本最厉害，我們与任何人合作都可以，但不能与日本合作。”因此，索王对日本存有戒心，遂应付

說：“你們日本有力量你們就設，要征詢我的意見，我是不同意的。”并推托身体肥胖，动轉維艰，不能前往，可派协理胡图里前往奉天、长春等地一行。田中久等走后，我陪同班禅到达烏珠穆沁右旗，索王对我提起田中久前来要挾設置特务机关和电台一节，甚感头痛，乏于应付，問我怎办，我不敢同他直接談自治的事，答复他說：“班禅佛爷正在此地，何不請求佛爷指示明路。”索王就同我去見班禅，請示对策。班禅即答复說：“前次德王和我說的聯絡錫、烏、伊三盟会商蒙事很好，現在正是时候了，积极去做就对了。”索王当下也表示贊成，于是第一步說动成功，就請索王以盟长名义做出公文，盖上盟长大印，派我代表錫林郭勒盟去見烏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后又加派烏珠穆沁旗的协理若乐格尔扎布一同前往。我遂偕同亢仁、丁我愚、阿乐騰格尔勒等馳赴百灵庙，先派員与云王送去公文并向云王表达請其出而倡导自治之意，云王当时还徘徊不定。恰于此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等一行前来宣撫，經由四子王旗等地到达了百灵庙，亢仁当将我等候云王前来研究倡导自治問題告巴，我也請巴去劝說云王早来。巴文峻虽然身負宣撫蒙旗归向国民党中央的使命，却对內蒙自治也尽心贊助。他在南京时，曾参加过参謀本部边事研究組，討論过这一問題，知道地方自治性质的內蒙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許可之列，遂允前往劝說云王，云王这才表示愿意与我共同倡导自治，当率同其弟根敦扎布和仕官們沙拉巴多尔济、那逊瓦齐尔等

前来百灵庙。这时烏珠穆沁右旗台吉若乐格尔扎布亦赶来参加。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會議，八月二十四日发出通电。当时潜伏在我旗庙上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务人員笹目却向韓凤林說：“你們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我們日本軍的力量到达这里时，再进行发动自治为宜。”足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們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自治，不感什么兴趣，而是企图在日本的卵翼之下进行自治。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了第二次自治會議。其后黃紹竑、赵丕廉来百灵庙，經過許多周折，虽然爭得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一般称百灵庙蒙政会）的組設，但我們极不滿意。当下决定除通知各盟旗选定晋京代表要求許可內蒙自治外，并派陈松山（蒙名布仁巴雅尔）前往包头面見孙殿英，請其支援自治。据他回来报告說：“我見孙殿英后，力表內蒙自治絕无其他背景，純系蒙人迫切的要求，以期把各盟旗团結起来，实行御侮图存，請大力支援。孙殿英甚表同情，并說就是內蒙自治有外人背景，也沒有什么关系，他仍尽力支援。”同时我又派韓凤林前往北平日本大使館分支机构，探詢对內蒙自治的态度。韓凤林回来报告說：“我到北平曾見着日本大使館的柴山武官，請支援內蒙自治，他說現在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很多，不断发生冲突，但仍保持邦交，內蒙自治系中国內政問題，日本不便出面干涉，言下頗为冷淡，对內蒙自治似乎不感什么兴趣。”我听到韓凤林报告后，认为柴山武官是日本的外交人員，不便表示对內蒙自治的态度，乃又派

补英达赖前往伪满面见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绍与日本关东军吉冈安置参谋接洽，托辞购买枪支，探询日本关东军对内蒙自治的态度，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归。

三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领到开办费两万元，用以维持办公和职员的生活，每人支給十五元生活费，仅够伙食之用。这样勉强维持，终非久远之计，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请领经常费和建筑费，但尽管函电交催，亦无结果。我为了解决这个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密派陈绍武前往庐山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临各费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切需要。结果得到蒋介石的答复，准予拨给经常费每月三万元，建筑费十二万元及枪械电台等物，嘱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至于怎样对待日本人进出西蒙问题，蒋介石答复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嘱陈绍武转告我，他不久即来绥远巡视，请我和云王前往相见晤谈，还叫陈绍武给我带来他的复函一封，内容也是和对陈绍武所说的大致相同。

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韩凤林被捕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据我了解有三：（一）在蒙政会成立之后，我派韩凤林为保安处第一科科长，云继先为第二科科长，朱实夫为第三科科长。当由蒙政会下令叫各盟旗选送蒙兵，贲成

保安处組織保安队，并派韓凤林随同本会委員托克托胡前往南京与有关机关接洽保安队的編制和請发經費及武器事項。韓、托走后不久，錫林郭勒盟各旗就选送蒙兵前来，我就責成朱实夫主持組織訓練。因为烏珠穆沁右旗的蒙兵，不慣基本訓練的約束和語言隔閡的关系（朱实夫不懂蒙語、蒙兵不通漢語），对朱实夫有了不滿情緒，群向宝道新反映，宝对該旗蒙兵表示同情，反說朱实夫应当迁就蒙兵的生活习惯，在訓練上不必操之过急，这种說法当然引起朱的不滿。迨韓凤林返后，朱就将这事的經過向韓叙說，希望得到韓的同情和支持，不意韓对朱却未表同情，反說宝道新的意見对，这又引起朱对韓的不滿。接着我又发表韓兼保安队的总队长，朱实夫想取得总队附的职位，我也沒有給朱发表，这是我对人事安排上失当。朱主持訓練保安队一場，落一个費力不討好，連一个总队附也沒到手，当然更为不滿。在这以前，蔣介石蓝衣社的特务李才桂率同工作人員以“内蒙旅行团”名义前来百灵庙偵察情况，当时因韓凤林赴京，我就派朱实夫接待他們。韓凤林返后，李才桂才来拜会我，我对他說：“你如有事，可与韓凤林接洽，因为我事情多，誠恐招待不周。”但是韓凤林却沒有很好的接待李才桂，招致李才桂的不滿。李曾向朱实夫說：“韓凤林这个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很难与之洽談。”朱实夫曾将此話告我，却未引起我的注意。并且在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日本人常来錫林郭勒盟和百灵庙拉攏我，我也叫韓凤林充当日語翻譯（因韓是日本留学生

在士官学校毕业)，朱实夫也可能把这事向李才桂反映。其实韩凤林是个民族主义者，仅仅做了我的日语翻译，并无拉我投日的行为。记得我曾和他谈过：“在当前时局下，我们要利用日本的力量，把蒙古复兴起来，你看怎样？”韩对我说：“我在日本留过学，深知日本的满蒙政策是不怀好意的，应当十分注意。”李才桂认为韩凤林有拉我勾结日本的行为，便报告了驻在北平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当韩凤林赴北平忌戒大烟瘾时，就被宪兵三团逮捕，这是可疑原因之一。（二）韩凤林由南京返回我旗时，曾向我报告说：“我在南京充当军官训练班教官时，桂永清曾一再拉我入蓝衣社，我坚决表示不肯，愿意回蒙工作。”由此推断，因为韩凤林拒绝参加蓝衣社而遭忌于桂永清，也是很有可能的。记得在韩凤林被捕后，我曾电请桂永清居中营救，桂给我复电仅一句话，说：“我已将原电转呈委座了”，表示甚为冷淡。这是可疑原因之二。（三）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后，由吴鹤龄介绍赵汇川，由万福林介绍刘建华前来百灵庙，我都委以工作。嗣我发现赵汇川有曾扩情给他的密电本，他知道被我识破后，反将密电本献出，实以告我，表示忠诚。我曾囑他将蒙政会经费未发、工作人员不安情况密电曾扩情，希他转以告蒋，促使经费的速发。当时关起义任蒙政会电台总台长，认为赵汇川私发密电，形迹可疑，曾向我告密。我说这事我知道，叫他把电报打出去吧，关起义也就放心了。但赵汇川是否持此密电本或以其他信函方法密告情报，我再未注